

贾庆军
著

浪漫与现实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莫斯科的关系之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出版社

贾庆军 著

浪漫与现实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莫斯科的关系之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与现实——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莫斯科的关系
之历史考察/贾庆军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9 (新纪元文丛之二)

ISBN 7-80170-220-4

I. 浪… II. 贾… III. 世界史-国际共运-研究
IV. 12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267 号

浪 漫 与 现 实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莫斯科的关系之历史考察

贾庆军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陈德仁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0.75 印张 28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书号: ISBN 7-80170-220-4/I·2

定价: 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共有五章。这一部分是由几个重要的事件构成的，涉及美共自建立到初次解散之间的重要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活动。其中包括：（1）美共的建立和初步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影响越来越大。（2）美共在农工党运动中的失败及其与莫斯科的关系。（3）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美国例外论”。这个“美国例外论”同思想界一直争论的例外论有所不同。美共内的“美国例外论”更多的是由莫斯科的路线斗争所致。（4）美共的人民阵线问题。美共的人民阵线是围绕农工党的争论展开的。美国共产党从最初坚持农工党政策逐渐走向了同“罗斯福大联合”的合作，由同政府的极端对立转变为绝对支持政府。（5）白劳德主义的兴衰。

第二部分描述的是美国共产党与莫斯科在经济领域内的关系。在这一领域内，文章具体叙述了从1919年美国共产党建立到1989年苏联解体这一漫长时期内双方的经济联系。

第三部分是美共与莫斯科在情报领域中的关系。文章先追溯了双方秘密活动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然后具体描述了双方在情报活动中的合作个案。之后文章进行了更深层的追述，希望从美国共产党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结构方面寻找其为莫斯科服务的根本动因。

通过对美共与莫斯科在经济、情报和政治等领域的关系的研究，本文得出了初步结论，那就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确实在方

方面面受到了莫斯科的影响，它们形成了一种类似主仆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并不象正统派所说的是单向的、天然的。形成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然而不管怎样，美国主流政治始终将之拒在门外

关键词：美国共产主义运动 莫斯科 美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ABSTRACT

The dissertation compose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core of the dissertation, it studies several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in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 such as: (1)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PUSA) and the formal integration of it. In the course of its integration, the effect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I) to the CPUSA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2) The loss of the CPUSA in the Farmer—Labor Party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Moscow. (3) Th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It was caused by Moscow and was different from th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rgued by the modern scholars. (4) The tactic of the People’ s Front of the CPUSA. The People’ s Front tactic put forward by CI was carried on by the CPUSA in the form of Farmer – Labor Party. (5) The rise and fall of Browderism. The fate of the Browderism was same a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The second part studie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CPUSA and Moscow. It detailedly described the econom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PUSA and Moscow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PUSA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intelligenc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PUSA and Moscow. It traces back to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secret activities of the CPUSA and Moscow , and wa-

nts to find the reasons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s for their service to Moscow.

The dissertation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by the studies of the three parts, that is : Moscow heavily affected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everywhere and their relations lik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 But this kind of relation was not unilateral and natural just like what orthodox scholars said, it was bilateral and formed by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atever it was, the CPUSA was always rejected by the main strea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movements.

Key Words: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Mosc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前 言

“感谢命运的宠爱和诅咒
我已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天使还是魔鬼
是强大还是弱小
是英雄还是无赖……
如果你要以人类的名义把我毁灭
我只会无奈地叩谢命运的眷顾”

这是镌刻在巴比伦花园砖墙上的诗句。读后使人不禁惊叹于古巴比伦人的智慧，简洁的几句话，却如谰语般深刻地道出了人的本性及其命运。在这喃喃如忏悔般的诗句里，我们仿佛听到一个领悟了神明的启示的人在说：“神秘莫测的命运之神啊！有限的和脆弱的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在遗忘中我要么妄称为神，要么化身为魔鬼，以至于一系列的悖论现象在我身上奇妙地发生了：我渴望成为天使的努力造就的却是我魔鬼般的行为；我外表的凶悍、强大反衬的是我内心的虚弱与无聊；我史诗般的英雄壮举后面包裹的却是市井无赖样的莽撞与无知。所以，万能的命运之神，如果你厌倦了我这样一个颇显荒谬的混合体而想将我毁灭的话，我也毫无怨言。”

这是懂得自己的有限性的人的智慧而谦恭的声音。然而在我们现在将要进入的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中，我们将会听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如果说前者有着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承认自己无

法完全把握自己命运的诚实和谦恭的话，那么后者则充满了自以为义且自认为能完全控制自己以及人类的命运的傲慢与自负。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与莫斯科的交往中，我们将会仔细聆听这一声音。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共产主义精神和先锋队理念也传到了美国。美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借势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他们于1919年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成立了两个共产主义组织——美国共产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这就给美国初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既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混乱。按共产国际的逻辑，真理只有一个，掌握真理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只有一个，而美国一下子就出现了两个，这不是很荒谬吗？于是共产国际下令两个美国党立即统一起来。

而此时的美国共产主义者还不大习惯共产国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知道莫斯科的厉害，再加上共产国际的管理体制还不太完善，所以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有着一定的自由，他们甚至还置共产国际的命令于不顾，从各自的宗派利益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斗争活动。从“密执安集团”到莫尔的分裂，从联合会问题到“鹅派”与“取消派”的对立，其间的明争暗斗、分化组合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随着共产国际权威的逐渐渗透，美国共产主义者对莫斯科的权力机制和统治模式的日益熟悉和接受，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被纳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轨道。1923年4月，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走出了宗派斗争的泥潭，在一个统一的组织——美国共产党（其公开名称为“美国工人党”）——的领导下融入了共产国际的大家庭，成为了“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钢铁般的统一的国际组织的一部

分。”^① 融入国际大家庭的美国共产党人在美国开展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开的活动，就是在美国日益高涨的农工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任务，目的是想通过与各国改革主义、进步主义运动的合作将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美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其公开组织——美国工人党——来贯彻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

美国工人党有两次走入美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机会，一是约翰·费茨帕特里克领导的芝加哥农工党运动，一是处于拉弗莱特“第三党”运动影响下的明尼苏达州的农工运动。但是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美国工人党不仅未能走入美国工农大众，反而成了它所厌恶和排斥的农工运动的破坏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告诉美国共产党人，“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策略不过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具……，一旦你们把本国大多数劳动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我们立即免除你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应当善于接近目前这样的群众，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把他们纳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轨道，到这里以后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了。”^② 这种心态根本不是想去搞统一与合作，而是要变相地摧毁其他工人政党的领导，从而将工人控制在唯一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手中。正如共产国际另一个领导人所说：“我们走上这条路（统一战线之路——笔者）不是因为我们想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而是因

①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五卷，第 177 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 177 页。

为我们知道，他们将会在我们的拥抱中窒息而死。”^①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呢？悉尼·胡克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借助于他们奇妙的神秘而非常便利的理论，认为共产党比工人阶级本身对什么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知道得更为清楚，他们便能自称任何不同意他们的工人都是敌人的特务。”^② 这一心态逻辑的具体展示是这样的：“（1）共产党构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2）它之所以是先锋队，是因为它知道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3）如果工人们不承认领导自称为先锋队的主张，那是由于（甲）资本主义宣传的愚弄，或是由于（乙）存在着其它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些政党由于缺乏知识和廉耻而把他们引向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或是由于（丙）在熟练工人中涌现出一些有特殊利益的人，他们宁愿要眼前那种庸人的稳当的实利而不要未来的光荣的诺言；以及（4）除非在指导夺取政权运动的政党‘领导’之下，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③ 而正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美国工人党在农工运动中的行为与上述逻辑一般无二。它先是说要同进步农工运动联合，但待它走进会场时，却宣称其它工人政党不配领导工农大众，能领导他们的只有美国工人党，因为它最了解他们的利益，只有它能真正地解放他们。然而美国工农大众不买工人党的帐，他们认为他们的利益只有自己最了解，那声称能彻底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不过是神话的散播者而已。而且他们对工人党那种自认为“救世主”的自负与霸道神态深为厌恶，而且它那惟我独尊的派势是在贬低、嘲讽甚至咒骂其它工人政党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谁会欢迎这样的领导者呢？

① 菲力普·杰夫：《美国共产主义的兴衰》（Philip Jaff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Communism），纽约1975年版，第35页。

②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③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172页。

各农工团体和组织纷纷拒绝了工人党的加盟。被大众所抛弃的工人党在咒骂了一通美国农工的“愚昧”、“无知”之后便退回到它的宗派状态之中去了。

同美国大众的疏远反而促进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同莫斯科的联系。随着与莫斯科的交往的加深，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色彩越来越浓厚，不仅其思想、行为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共产国际和俄共，而且俄共以及共产国际内的清洗疯狂症也传给了它。关于新美共书记洛夫斯顿的“美国例外论”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美国例外论”更多的是产自于莫斯科的权力斗争而不是美国本土。这时的俄共已从党的专政转变为对党的专政，如胡克所说：“一个政党的专政如不使它自己内部的组织成为专政的组织，就不可能长期有效。”因为“由于有控制党对之行使专政的人民群众、同真正的和硬被说成的敌人作有效斗争、强加划一思想体系的必要，就迫使党采取一种军事的、有时称为铁板一块的结构。非党群众的利益既因没有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不可能公开表达，就很自然地趋向于在党的内部分歧中，在形形色色的派别争论中表达出来。但是除非把党本身队伍中分裂的事实和现象对非党群众掩盖起来，就不可能有效地运用那一党专政。党内的统治集团为隐匿这种分裂并夸耀最大程度的统一，一定便要调节和控制群众中的意见表示。它就必须行使一种甚至比对非党报刊还要严格的对党报的监督。而为了行使适当的监督，领导集团就必须使它自身统一起来。把意见不同的人们孤立起来，使他们噤若寒蝉，被流放、驱逐出境和枪毙。领导集团的统治必须用一种神话来加以巩固，这种神话竭力颂扬那个跨上金字塔形组织的顶峰并对任何问题所说的话便是法律的‘领袖’、‘敬爱的信徒’、‘铁一般坚强的人’。任何一种的反抗都等于是叛逆。那些决定都是‘一致’批准的；要是做不到的话，那就不管什么理由都会变成破坏行为；今天的保守缄默，便是明天

叛逆的信号；一次清洗的工具便变成另一次清洗的牺牲品。”^①发生在俄共内的权力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结果同胡克分析的丝毫不差。如果说在列宁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向党专政的过渡时期，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党的专政已转向了对党的专政。其表现是对一切异己分子实施清除、流放甚至是残忍的警察恐怖措施。

受俄共（后来改为“苏联共产党”）控制的共产国际自然也跟着转变，它由“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转变为对各国共产党专政的大本营。这种由对组织外的专政转变为对组织内的专政的现象是哲学家们应该关注的事情，这里不再赘述。那么洛夫斯顿及其“美国例外论”是如何成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端并成为共产国际专政的对象了呢？洛氏的“美国例外论”本来启自于布哈林的关于美国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论断，而此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同托洛茨基作斗争而提出来的。然而当布哈林协助斯大林在俄共及共产国际内清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之后，布哈林本人就成了斯大林要清除的对象。所谓“一次清洗的工具便变成了另一次清洗的牺牲品”了。作为布哈林的忠实的追随者的洛夫斯顿自然也在劫难逃。在前一阶段他仿效共产国际在美共内掀起清洗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在这一阶段要被清洗的则是他自己了。当他不屈共产国际的裁判而提出抗辩时，斯大林告诉他：“如果你试图发动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斗争，明天你们就会失去多数并将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了。”^②在铁板一块的共产国际内，惟有服从，不能反抗。最终洛夫斯顿被莫斯科清除出了共产主义世界。不过对洛氏来说，这也许是件好事，呆在这个共产主

①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166页。

②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Johnpoll,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康涅狄格·伦敦1994年版，第二卷，第136页。

义和社会主义理想日益被扭曲的共产国际内，等待他的只能是更多的疯狂和更大的奴役。

接下来的几年，在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陷入了无法无天的狂热运动之中：在苏联是狂热的建立全国性强制劳动营以及造就新神的活动；在共产国际则是驱动各国共产党去摧毁其他工人政党，带领工农大众进行世界革命的极左行为。美共也不例外，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之炉烧得越来越旺，其炙热的意识形态话语随意泼向“革命的敌人”，而所谓的“敌人”就是不顺从它、不听命于它的工人组织和个人。这个高喊着要“拯救全人类”的、自认为是天使的组织，其行为却形同魔鬼。它想要将人类带入天堂的光辉理想造就得却是它对眼前的同类进行咒骂、讽刺和唾弃的形象。

当德国共产党咒骂社会民主党从而便利了希特勒的上台，并最终导致德共自己的毁灭时，共产国际才如梦方醒：它和它的“敌人”原来是同命相连的，法西斯主义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才有了共产国际七大和“人民阵线”。这是共产国际首次试着平等地看待其它工人政党和进步力量。

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人民阵线”的指示后，美国共产党人立时改变了政策，多年来的意识形态训练已让它不必考虑共产国际的指令对错与否、前后是否矛盾了，它只要做到令出即行就够了。共产国际先是建议美共以一个广泛的农工党运动来实现人民阵线策略。这还是先锋队意识的残余表现。但美国公众早已对美共失去了兴趣，更不必说要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全国性农工党了。在斯大林的催促下，美共转而宣传以罗斯福的民主党为首的“民主阵线”来实现“人民阵线”的目标。这一举动是因为斯大林需要西方民主国家帮助苏联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才做出的。当西方国家对此不大热心时，斯大林便与德国签下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批判的矛头又指向西方民主国家，“人民阵线”

的调子也迅速降了下来，美共也重新攻击罗斯福、邱吉尔为“战争贩子”。但是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突袭苏联后，“人民阵线”的口号又空前高涨起来，美共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对罗斯福的赞颂达到了顶点。这种要么全部抵抗，要么全不抵抗的极端心态的变幻是共产国际铁板一块的思维模式的典型反映。正是在这种极端心态和极端行为的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白劳德修正主义”问题。用白劳德自己的话说，他一直是莫斯科的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作为美共多年的总书记，他本该谙熟莫斯科的政治法则。可能正是这种过分的熟稔造就了他的失败。他的每一步都紧跟着莫斯科的步伐，共产国际号召建立“人民阵线”，白劳德就带领美共去建立“人民阵线”，要他支持罗斯福，他就去支持罗斯福。但是莫斯科的某些步骤是不能模仿的，是只归于斯大林一个人的特权，比如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理论、调整共产国际的策略方向等。而白劳德却自作聪明地去抢斯大林的风头，岂不是自找倒霉。

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同邱吉尔、罗斯福等签署了倡导战后合作的《德黑兰宣言》时，白劳德顺势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当斯大林为获取西方民主国家的好感而解散共产国际时，白劳德竟效仿斯大林要解散美国共产党以促进莫斯科所要求的统一阵线。白劳德还自称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殊不知他已犯了莫斯科的禁忌。除此之外，莫斯科也已渐渐不需要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合作，而是要与之进行争夺与对抗了。于是，莫斯科指挥一个法共领导人杜克洛斯撰文批判白劳德的行为。这篇名为《关于美国共产党的解散》的文章实为莫斯科所作。文章称白劳德的许多观点都是“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对斯大林的立场的歪曲。美共内立刻掀起了批判“白劳德修正主义”的高潮。不久白劳德就被美共开除了。莫斯科只是间接地显示了一下它的权威，就收到了如此显著的效果，可见其对

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已到了何种地步。

在此之后，美共就可以任莫斯科揉捏了。莫斯科让它同美国政府去合作它就去合作，需要去对抗它就去对抗。正如亚历山大·科热夫所说：“斯大林……要把他的臣民揉成面团，然后捏成他所需要的形状，……违法或守法都被惩处，没有什么东西能挽救你。”^① 是啊，无论反抗斯大林的洛夫斯顿，还是顺从他的白劳德，都被斯大林那不可捉摸的法律所惩处了。被他们奉为天堂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是这种理想的虚幻性，还是如胡克所说，莫斯科早已歪曲和抛弃了社会主义，其种种动听的言辞不过是“它对早已实际上抛弃了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作的官样文章的假日祈祷而已”？^② 跟随这样一个主人给美国共产党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奴役和荒谬行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美共秘密党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她被莫斯科莫名其妙地定罪并驱逐出苏联时，美共不仅不帮她澄清事实，而且还用各种手段捏造证据证明莫斯科是正确的，甚至还开除了为斯特朗说话的美共党员。无怪乎斯特朗会称美共是那么的“奴性十足，没有指望。”^③ 除此之外，美共与莫斯科的关系还体现在它们的经济关系和情报关系上。在前一领域，关于“莫斯科的黄金”的争论在美国曾喧嚣一时，最近的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显示，确实有“莫斯科的黄金”的存在。美共从其一建立开始就接受了莫斯科的大量资助，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70年间美共的活动一直受到莫斯科的资助。虽说不上有求必应，但莫斯科的援助多次挽救美共于濒危之际。这些资

① 拉明·贾汗贝格鲁：《伯林访谈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

② 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164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陈裕年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2页。

助在表面上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它在加强莫斯科对美共的控制的同时也助长了美共对莫斯科的依赖，这就加重了美共“奴性十足”的特征。莫斯科的这种控制一切、包揽一切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各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还给它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在情报领域内，美共也甘心成为莫斯科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如它协助苏联间谍暗杀托洛茨基，清除国际纵队中的托洛茨基分子，为苏联窃取原子情报等。无论是莫斯科还是美共都为它们这些行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从共产国际这方面来说，为“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服务是各国共产党的义务，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为此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与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对于美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为这一最高理想而冒犯本国人民的利益是值得的。那么他们如何调和其天使般的理想和魔鬼般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呢？他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又是什么呢？列宁的这两句话有助于消除他们的道德困惑：“道德是为摧毁旧的剥削社会和将所有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而服务的”，“我们说我们的道德是完全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这一利益的。”^① 所以，只要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人类最高理想而奋斗，至于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就是次要的了，因为任何行为都能在这一理想中被辩护为正当的。

向往天堂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以及美国党内的专制和教条作风也能够忍受下来，并甘心为其所驱使。正如美共资深党员吉尔·格林所说，尽管党有各种缺陷，但若让他重新选择的话，他还将选择美国共产党，因为“我不知

^① 根特·列维：《失败的事业》（Guenter Lewy, *The Cause That Failed*），纽约牛津 1990 年版，第 27 页。